



從利瑪竇的精神看 基督宗教與中國的關係

沙百里著
劉賽眉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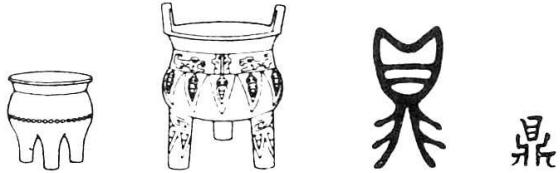
今日處於不同環境中具有影響力的天主教人物，在其發言中，往往讚揚利瑪竇的精神，中國天主教的領袖亦不例外，這可見於一九八一年十月的滿地可國際會議，或他們在北京接見外賓的談話中。教宗在馬尼拉對中國天主教徒所發表的談話亦如此。由此可見，利氏的成就匪淺，甚至在他抵華四百年之後的今天，他仍是一位有力的中介者。雖然，要提到利瑪竇可以有許多的理由，但這些理由均離不開利瑪竇本身。

從一開始，天主教愛國會的領袖便強調利氏在科學上的貢獻。（註一）在中國推行現代化和中西科技交流的框架裏，利氏的貢獻可以被視作典範。某些中國神學家喜歡提及利氏對中國禮俗的尊重以反對文革時代的批孔運動，他們批評教宗禁止中國人敬祖因而阻礙了中國教會的發展。（註二）這些敬天祭祖的禮儀曾一度授予皇室官宦權力，成爲了中國統一及獨立的標記。今日這些禮俗

已轉換爲別的標記——就是擁護社會主義以及黨的方向的標記，忽視這些新標記可以被視作對中國內政的干擾和對中國獨立自主的攻擊。

台灣亦大事慶祝利氏來華四百周年，特別強調他傳教的成果和對中國文化的尊重。（註三）利氏在福音的光照之下，更新了儒家的傳統，指出了儒學中的新幅度。利氏的努力成爲了建立本地教會的靈感泉源。

最後，羅馬亦視利氏爲對世界及各地文化開放的先鋒。在梵二以後，許多教會文献皆鼓勵交談的精神，譬如：「教會在現代世界牧職憲章」、「祂的教會」、「在現代世界中傳播福音」。昔日利氏得到了中國知識份子的接納而成爲了他們的朋友，今日他又成爲了羅馬表達交談意願的象徵。在利氏身上，尊重政制、欣賞文化遺產、以及注重交談，三者鼎足而立。這三種態度爲利氏帶來了友誼的分享。利氏如何能夠奇蹟性地維持了三者的平衡呢？現且稍作分析，如下：



(一) 尊重政制

利氏並不缺乏政治的資格，這位來自馬薩拉達的意大利人，生長於政治家馬基維利的時代，當時的意大利，權力衝突，諸王侯互相敵對，情況並非中國的官僚政治可比。利氏善於觀察政治動向，選擇那些有能力促成他的事業的人物為友，然而，他的做法是出自基督徒的立場。他與正直無私的官員交友，其中一些常批判現行政制的腐敗。利氏一方面分擔他們對人民的關懷，另一方面又答覆了他們對科學知識的渴求。這些高官顯宦為利氏十分珍貴，因為他們替利氏逐步打開了前往北京的途徑。利氏傳教的目標是中國的皇帝。由於在君士坦丁皈依後，西方逐漸變為基督教國，利氏遂認為，若中國的帝皇奉教後，中國也會步武西方國家的後塵。（註四）雖然，利氏在這方面的努力，成效不大，但亦不可忽視。至少，基督徒在北京首都獲得了一塊土地，他們在此可以開始紮根。他們聚集了數百位既聰敏忠誠、又關懷國家福祉的博學之士。然而，他們的忠信並非基於利氏的政治才能，而是受利氏的人格所吸引。

利氏在政治方面的成就，雖然很有限，但也為他帶來了禍敵。在一六一〇年利氏逝世後，反基督宗教的作品開始出現。一位保守的官吏楊光先，惱怒天主教，大力抨擊利

氏的宗教著作——天主實義。（註五）甚至在羅馬頒佈祭祖的禁令之前，利氏已經被指斥為埋葬天朝制度，因利氏提倡敬拜天主和在天主前衆人平等。由於利氏既為外籍人士又與澳門、羅馬有關，他被懷疑為破壞國家安全的謀叛者。這些懷疑在利氏生前並未出現，但當中國各地設立了教堂之後，這種懷疑日益明朗。

雖然利氏重視中國人的思想方式，但他並不因此而犧牲了基督信仰的內涵。他勇敢地肯定信仰的主要訊息，包括：愛天主在萬有之上、以及天主召叫一切人成為祂的子女，不分男女。這些訊息很可能被誤解為危及天子之特權和朝廷命官的權利。然而，那些開明的中國知識份子却能夠從這些訊息中看出需要更忠於君王及國家的訓示。

(二) 了解中國的文化傳統

當利氏的朋友為他辯護時，往往指出他的博學多才、道德修養、和對中國傳統文化的了解作為理由。利氏既渲染了啟蒙運動中人文主義的精神，又曾飽享希臘及拉丁的古典著作，所以他能夠完全打入這個關心人類進步的中國，而這進步當時是建基在儒家學說的新註釋上。步武着范禮安和羅明堅兩位會友的芳踪，利氏悉心研讀中文和學習中國的傳統文化。他效法希臘教父，特別是亞歷山大的格來孟，他運用希臘文學家荷馬和哲學家柏拉圖的學術遺產來服務基督徒的思想。不僅利氏的科學論著以及由西方帶來的物品吸引人，而且，他對儒學的知識也一樣使到他的聽眾驚羨。（註六）然而，他對中國古籍的註釋有可商榷之處。利氏既另有用心，很想在孔子的思想中找出啓示的痕跡，故

他多少模擬了一個合符他的目的的孔子。（註七）他以自己對孔子的註釋來擯斥一連串對孔子越軌的解釋。雖然，在當時政治改革的環境中，這樣的做法司空見慣，但利氏的做法顯然是另有原因。他的做法是答覆了基督徒的迫切需求：即是：淨化中國的傳統智慧——它以人為中心，其世界觀亦頗封閉（並未曾向超越開放）。利氏的傳教策略亦很關注目前的成效，他以實用的態度援引孔子，實有歪曲這位中國聖賢的思想之嫌。他的敵人常常譴責他有些「造作」，對孔子的真正思想不認識。有時，他的友好在這件事上亦感到尷尬。那些同情利氏的儒者，敬仰利氏只因為他的倫理教訓有百分之九十與儒家傳統融合。但他們却很惋惜利氏信奉這些奇異的教理——創造主、靈魂不滅、天堂地獄、罪和被釘的救主等。

（三）護教的交談

看來，豈非中國的知識份子最友善嗎？因為他們找藉口以寬宥利氏的弱點——那就是他最後所要傳遞的福音訊息。無論如何，聖保祿在他的致格林多人書中，毫不猶豫地以基督十字架的愚妄，擯斥了人間的智慧，「為智者看來是愚妄的，為天主却是智慧。」聖保祿在雅典的講道考慮到希臘的智慧。十六世紀的耶穌會士兼人文主義者，追隨其會祖聖依納爵，一方面緊抱基督的十字架，另一方面則投入當時盛行的「知識遊戲」中。由於他們受過高深的教育，並不以為科技的發展必須威脅到信仰。相反，為他們看來，人類的進步和知識的發展更彰顯天主的光榮。他們對人的理性有信心，因為人是天主的肖像，理性亦是由天主所創造。

利氏受這種精神的薰陶，有心準備交談

。他所要達到的交談是護教的、亦是戰鬥的。交談成為了利氏說服別人的武器。無疑，按照中國的禮俗，利氏對待與他交談的人一如朋友；但事實上，他們是利氏的敵人，利氏必須除去他們的錯誤，使他們歸順真理。在中國的知識份子方面而言，當時自由和公開的討論形成一種潮流，常在私人書院舉行。（註八）在討論中往往以儒家的倫理原則來攻斥政府中央集權之濫用。（註九）而利氏則運用這些倫理原則來支撐福音的訓令。他力斥當時儒者所輕蔑的佛道兩派的傳統論證。由此，在合儒反道佛中，利氏獲得了儒家學者的同情，而利氏亦更鞏固了儒者的權力。無論如何，在當時的中國社會裏，這種遊戲相當危險。他常常令到一些有心尋找真理和誠懇的人「丟臉」。或許可以這樣說，這種有系統地打擊對手的「舌戰」，並非強者的標記，反而是他弱點的流露。

再者，為了達到護教的目標，這種交談既不平等又混亂，因為交談的雙方所講的是兩套不同的語言。雖然利氏是講中國話和用中國的表達方式，但他講道的結構及其所運用的概念常常引致誤解。利氏應用了經院神學論證所慣用的西方邏輯，這邏輯主要建基在矛盾律和細微的區分上，加上利氏自己所掌握的理由，這位經院派的邏輯家力證反方立場的錯謬。

在中國人方面來說，他們的目標是協調正反兩面，視矛盾為同一真理的兩極；況且，中國人不僅容易被說服，和有兼容並蓄的個性，而且更有高貴的風度，常常對敵人留有餘地，使到對手能夠昂然離去。他們視脫離現實的推理為徒勞無益，因其建基於抽象的觀念。因此，在交談中，兩方可謂同床異夢，這位西方的朋友沉醉在繁鎖的區分和差

異中，而他們（中國人）却在尋求和諧統一。雖然，在許多方面，都像是聾子之間的對話，但中西思想的首次相碰並不缺少冒險的胆色和勇氣。無論如何，這些消極的因素不必掩蓋了這交流中的積極效果。

利氏的傳教事業奠基於福音的愛德上，而這愛德正好迎合中國倫理注重友愛的精神。利氏重視中國的古籍，後來更將之翻譯，以享西方，這是他在人文方面的貢獻。從基督徒的觀點來看，天主的智慧在中國的傳統文化裏能夠以新的面貌出現。從利氏的「交友論」中，可見他知道如何藉着善心和文質彬彬的風範取得了中國人的心。（註十）藉着他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知識，他成功地降服了他們；他常常引用孔子之學說，使到他們也忘記了他所携着的經院思想的軍械對他們有威脅。

在西方的傳統中，對希臘文化最後征服了那些野蠻好戰的羅馬人的事件，記憶猶新。所謂「（在軍事上）被征服的希臘最後（在文化上）征服了她的征服者。」難道中國不會扮演與希臘相仿的角色嗎？中國向來就稱西方為「蠻族」。



利氏的經驗為今日是個很好的教訓。日子過去後，回顧歷史，利氏在戰術上的錯誤更為明顯，然而，我們不要以為我們今日不會犯類似的錯誤。利氏的作證仍然有力，成為啟迪的泉源。在這四百年中，世界和教會都有很深的改變，可是，中國的文化仍然保持著同樣的特質，而基督的訊息繼續維持其「常新」的面貌。至於基督教與文化之間的相遇，今日仍舊可以由政治、文化、和「交談」的基礎上去看：

（一）處身於政治的環境下

尊重中國的政制仍如昔日一般有效。就如在利氏的時代，中國的政制現今亦非統一而不分派系，相反，不同的黨派，此起彼落。政府的過份專制獨裁，不論是由於官僚主義或是由於文革的極左派份子所造成，今日都受到統戰領袖的批評。這些領導人企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和追求國家的現代化。目前的政制實用得足以容納有限度的宗教自由，又希望凝聚國家的一切力量。這不是一個機會給基督徒與中國的領袖發展友善的關係嗎？國內的基督徒很自然地負有使命去在這方面證明自己為良好的公民。

（二）了解中國人民的新文化

授予朝廷權力並鞏固其結構的孔子思想已遭摒棄。取而代之的是源自西方的一套意識型態，這套思想強烈抨擊一切宗教，但却保留着基督徒信仰中的某些因素：例如：服務人群、解放無援及貧窮者、推翻強權及富霸。中國的傳統文化更深地加強了來自西方的共產主義的理想——服務人民。推行倫理教育的種種努力實際上又重建了儒家倫理的某些原則。家庭在教育上所扮演的角色又復

興。然而，這並非說目前又返回儒家的傳統。五十年來的近代批判亦非全無積極效果，過去抽象的行為規範，現今都落實踐行。雖然，經年累月的行為形式主義很難一夜之間消除，但當分析中國的社會情況時，原則上應保留其理想，而且還該盡力防止這理想淪為虛偽與貧瘠。

中國的人文主義對馬克斯主義亦有貢獻。最近，中國對馬克斯早期（青年期）思想的研究，強調他的人文目標，似乎較重視基本人權，包括：工作的權利、合理生活的權利、安全的權利等。在此，企望那些稍有學術背景的基督徒，不論是中外人士，努力倣效利瑪竇的精神，盡量留意一切可以得到的中國文學作品，尤其是與倫理、儒家、及科學有關的資料。

(三)友愛而具有批判的交談

過去數年來，中國的學者與外籍基督徒專家已經開始作學術性的交流。（註十一）自從利氏以來，某些改進會使到這種交流更方便，譬如：科學的語言日益普及；意識型態的先天假定逐漸下台，而客觀的原則和科學事實的驗證日漸抬頭。經過了歷史的教訓，神學家更尊重非基督徒文化的貢獻，不再野心勃勃，想作有系統的精神進攻以歸化他人。

由於交談的過程中牽涉到教理的原則，故此，交談的任何一方都很可能操縱了整個交談。在教會方面，她特別覺察到這個危險，至少是在她所關注到的事情上。教會曾經長期受到無神主義的批評，指其與世俗權力妥協，現在她更注意尋回自己的本質及使命，就是致力於宣揚福音的喜訊，釋放全人類。梵二以後，由於神學不斷地返回聖經、教

會的生活和禮儀中，它更注重以信徒在救恩歷史裏的宗教經驗為基礎。她與天主的關係是在服務人類中表達。基督徒和共產主義信徒都同樣關心人的尊嚴和進步，趨赴一個正義與和平的王國。的確，這很需要基督徒以行動去證明信仰並不逃避世界上的責任、信仰亦非壓迫者手中的武器。幸虧，在無神的無產階級統治的環境中，基督徒不可能如此。「基督徒應當成為良好公民」的呼籲調節了傳統某些消極而又純粹個人化的信仰表達。然而，倘若信仰不能積極地影響到社會，則這些呼籲仍屬徒然和沒有意義。

也許，基督徒最大的問題是在於對信仰的獨特性、創新性，以及對福音訊息充份解放的能力缺乏信心。交談不必意味着犧牲基本的真理：即是：人的獨立自主並不與接納神和與神建立關係衝突；神不使人成為奴隸，反而召喚人在服務他人和忘我中獲得真正的自由。神的恩惠和祂解放性的愛屬於超越界的事實，為受中國人文主義及馬克斯思想深深薰陶的人很難接受。可是，基督徒必須冒着被誤解的危險勇敢繼續宣揚祂，否則，基督徒的信仰最後會淪為純粹倫理或政治的意識型態。利瑪竇清楚地知道，某部份的福音訊息很可能引起反對及攻擊，但他仍然忠實勇毅地宣講，不沉默，不逃避。最後，讓我們忠誠地持續利瑪竇的這種精神！

附註：

註一：參閱藝舟著「利瑪竇在北京」中國天主教第二期 頁廿五至廿八。

註二：王子澄「由盲目服從到獨立自主」一九八一年十月的滿地可國際會議。

- 註三：國際信德通訊社，一九八二年八月廿一日 頁三五一至三五五。
- 註四：伯納瑪特、亨利著的「利瑪竇神父與當時的中國社會」（一五五二至一六一〇年）一書，對利氏的旅程及其傳教工作，描寫尤為詳盡。此書於一九三五年在天津出版。
- 註五：格納、雅各著「中國與基督宗教：行動與反應」巴黎 一九八二年。參閱第一章：「由同情到敵視」 頁七十九。
- 註六：這些物品中最特殊的是天文觀測儀、時鐘、三稜鏡。尤其是那幅置中國於中心地位的世界地圖。此外，利氏又送了一幀救主的畫像給皇帝，這幅以西方技術繪成的圖畫很有立體感，使到觀賞的人一方面欣悅於這位栩栩如生的主，但另一方面又以敬畏之情尊敬祂。
- 註七：參閱 格納、雅各的書，頁四十一。作者引用了厄利亞所著的「利瑪竇全集」，在該著作的第二九六頁這樣說：「我們的意見是建立在孔子的學說上，對於孔子著作中的疑難之處，我們按照自己的立場來解釋。」
- 註八：在利氏與金尼閣的報告中，可以找到這種討論的實例。見：基督徒在中國傳教的歷史（一五八二至一六一〇年）巴黎 一九七八年。參閱卷四的第七章：利氏與一位著名的獻祭者討論信仰的問題。「學者經常聚集，討論倫理和修德的事」。（見頁四二二）
- 註九：參閱 Cf. J. Gernet, Le Monde Chinois, (The Chinese World), Paris, Armand Colin, 1972, p.376.

- 註十：利氏的「交友論」於一五九五至一五九八年間寫於南昌。此書由七十六則格言組成，對友誼的了解深受塞尼加之影响。
- 註十一：在北京的「世界宗教研究院」所舉行的會議曾有歐美神學家參與。又或者在意大利舉行的紀念衛匡國和利瑪竇的會議，也有北京的專家出席。